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如何重新理解「中國」？或者，如何詮釋文明的治理與暴力？

What is china? Or, How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ance and the Violence of a Civilization?

doi:10.6752/JCS.201409_(19).0001

文化研究, (19),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 2014

作者/Author：劉紀蕙

頁數/Page：4-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01](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如何重新理解「中國」？

或者，如何詮釋文明的治理與暴力？

What is China? Or, how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ance and the violence of a civilization?

——編輯室的話

《文化研究》十九期的文章，以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重新解釋中國以及分析文明進程的治理與暴力的問題。

本期推出的「王國斌教授專題：明清中國與全球史的連結」，以王國斌的〈近代早期到近現代的中國：比較並連結歐洲和全球歷史變遷模式〉作為重點文章，邀請了朱元鴻、鐘月岑、何漢威、和文凱、黃克武幾位學者進行批評與討論，也請王國斌提供了回應意見。這個專題從構想、規劃人選到校對翻譯，都是由本刊編委李卓穎策劃與執行的，我們也特別邀請了本刊前任編委邱澎生撰寫導論。

王國斌於1997年出版的《轉變的中國：歷史變化和歐洲經驗的侷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以經濟學的角度重新詮釋中國歷史，修正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史書寫，被稱為「加州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此次本刊出版的〈近代早期到近現代的中國：比較並連結歐洲和全球歷史變遷模式〉，是王國斌於2013年受邀來台進行系列演講的三篇論文的彙整，以中國與歐洲的宗教、財政與工業發展，進一步以比較的視野提出全球歷史變遷模式的詮釋。王國斌認為，不同於歐洲的政教分離，中國透過儒家的行政體系深入民間，並由地方仕紳、宗祠、廟宇與書院進行與政府一致的禮儀教化，而完成社會的全面治理。王國斌主張，這種連結宗教禮儀的內化治理模式，說明了中國的「政教合一」。先不論中國作為一個「宗教國家」以及中國的「政教合一」可能引發的爭議，王國斌所強調的民間社會仕紳階級的組織，的確已經有橫向連結與點狀分佈的格局，而使得禮儀教化、擴充糧倉、墾荒耕地、治水修路、編撰類書、建立書院等工作在民間進行，而促成了治理秩序的穩定擴展與延續。王國斌認為，這種基礎社會結構，加上中國歷代節制稅收而藏富於民的財政制度，以及巨商富賈透過捐輸與政府官員合作的共構關係，解釋了中國工業發展的基本模式，說明了中國地方精英、仕紳、官紳與富商透過社會關係而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更揭示了中國當代經濟起飛的重要原因。

如果王國斌強調的是中國與西方不同的社會秩序體制，以及儒家透過禮教而完成社會秩序的穩定延續，湯志傑的〈文明與暴力共存的吊詭：從蹴鞠、擊鞠與捶丸的興衰管窺華夏文明的文明化歷程〉，則以不同的角度探討儒家文明化歷程的問題，並且直指其中內含的暴力。這篇文章回應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高度文明並且譴責暴力的中華文化，事實上卻出現如此頻繁而多樣的暴力行為？湯志傑主張，暴力與社會結構有關，更與文明共生。他指出，宋代以來儒家盛行的陰陽二元

結構，協助官方以道德為名增強政治控制系統以及政體的主導權；宋代以來日益集權的國家與地方仕紳，更聯手透過新儒家的文人價值啓動文明化，結合佛教道教因果業報之說，而在市井小民的世俗日常生活中發生影響。湯志傑以「文人化」的角度，說明從蹴鞠、擊鞠與捶丸等球戲從肢體暴力到抽象競賽的演變歷程。但是，他也強調，中國的文明化雖然抑制了表面上肢體接觸的暴力，中國帝國體制從封建轉型為疆域國家，透過中心與邊陲之二元結構與階層分化，卻無處不施展其控制性與壓抑性的暴力。此外，排除武人的文人論兵，以仁義道德來馴化暴力，反而使攻擊性的暴力透過階層分化與功能分化的不同管道出現。

王國斌與湯志傑的文章所討論的是傳統中國的新儒家或中華帝國的官僚體系與地方仕紳結合的禮教治理模式，而趙彥寧與汪宏倫的文章討論的則是1990以後到當前中國狀況的分析與詮釋。

趙彥寧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霸權與邊境暴富主體的交鋒：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案例〉，以大陸閩北國境邊區的海西特區與平潭綜合實驗區為例，探討在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發展之下，以金錢治理作為道德經濟準則而對民間社會造成的衝擊。對王國斌而言，官商合作，共同追求財富，以及中國經濟起飛，是成功的治理明證；對於趙彥寧而言，當前中國以金錢與發展為主要動機的社會，則根本地改變了人們的價值取向。趙彥寧認為，這個發展計畫表面上是中國中央政府針對台灣提出的「兩岸共同家園」，目的是連接兩岸的「超級城市群」，以跨海峽互動發展模式形成「海峽經濟核心圈」；但是，這個計劃的背後則預備了戰略性的部署邏輯，實質上影響了福建地區的基礎建設，也影響了當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一天一個億，三年一千億」的想像，使得處於「國境邊界」的人民有著追求暴富而與金錢政治共構的道德經濟。趙彥寧提出的問題是，在這種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之下，公民的社會能動性與抵抗空間是否還可能存在？

汪宏倫的〈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則檢視了大陸改革開放以降的新興中國民族主義風潮。汪宏倫所探討的問題是，1990年開始再次興起的新民族主義情感結構為何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同步？「紅色經典」大量改編為教材、文學作品、電視劇與電影，「紅色旅遊」的出現，《愛國主義實施綱要》的編定與廣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文化創傷論述的強化與戰爭紀念館的設立，以及先後出現的《中國可以說不》（1996）以及《中國不高興》（2009）——這些現象背後的脈絡是什麼？這些對於「中國」的強烈情感是被什麼樣的國際局勢所激發與增強？九十年代以降的民族主義真的與1949以後社會主義中國時期的大眾情感結構與「心的邏輯」無關嗎？汪宏倫指出，在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結構的背後，似乎隱藏著特定的「戰爭之框」的心態。

相對於前面四篇文章以重新理解中國的角度而思考民族社群的文明治理與文明暴力的問題，趙中麒與張勤瑩的文章則放在一個相近卻又遙遠的參考軸線，讓我們以不同的位置思考這個問題。

趙中麒〈流離在領土內、飄蕩在領土外？泰緬邊境克倫難民民族運動的空間爭奪〉指出，在歷史過程中，民族領土與民族社群不見得都是自然賦予而和平穩定共存的。不同的民族為了爭奪同一塊領土而發生戰爭或是內戰，持續多年，死傷數十

萬甚至數百萬，甚至造成長年存在的流離失所者非領土性領地的難民營，更是近兩個世紀頻繁發生的現象。趙中麒以中國雲南、寮國、緬甸及泰國四個國家邊境的克倫族為例進行分析，並且指出英國對於緬甸殖民而帶來的文化政策，衝擊了緬甸族的宗教信仰，也造成了當地統治階級以及其他族群之間張力的改變。英國殖民時期結束之後，克倫族並未如同暹羅族、克倫尼族以及克欽族擁有決定是否獨立的政治自決，以致於克倫族開始了長期的獨立戰爭。戰亂之下流離失所的難民被泰國收容，而先後成立了幾個克倫難民營。但是，對於提供土地安置難民的泰國而言，難民營同時也成爲了國境內反對陣營以及國際社會以人道救援而介入的複雜空間。在克倫難民營內，持續重複的受難者教科書與影片，造成強烈的民族主義集體意識，也使得民族主義式的革命情感不斷被強化。趙中麒提出的問題是，面對當前的局勢，克倫難民在這個非領土性的領地被泰國政府取消之後，是否能夠與緬族重新建立關係，還是克倫族的民族主義會延伸到泰國國境內，持續革命？從歷史進程來看，這種民族之間土地爭奪而造成的戰爭、流離失所與大量死亡，似乎是持續進行中的難題。

張勤瑩的〈傳教士子女在中國：內地會與十九世紀芝罘學校的創立〉，則提出了另外一個國境之內不同文化治理模式而內部循環的案例。張勤瑩以英籍傳教士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於1881年在山東煙台創設的芝罘學校作爲研究對象，探討這個爲了提供英國傳教士子女在中國接受英制教育而設立的學校如何執行其創校宗旨以及其引發的問題。張勤瑩指出，芝罘學校除了作爲傳教教育的場所，也提供醫療體系與育兒，更建立了完整的英制教育環境，包括延續牛津地區的考試方式、徵文比賽、體育運動，強化英國國家認同的戰爭時期愛國教育，甚至歷史與地理的教授範圍都僅局限於英國。這些爲了避免傳教士子女在非基督教環境中被同化，而在中國校園內規劃出與中國社會隔絕的教育系統，卻造成了這些長期居住在中國的傳教士子女失去了認識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機會。正如趙中麒所分析的克倫難民營一般，從張勤瑩的文章，我們也看到文化教育如何可以在一個國境內的封閉空間內部複製出不同於更大領土內的特定民族情感與認同模式，而使得文化的隔絕持續存在。

本期也刊載了謝世忠的人類學研究紀要〈不需對話的族群分類—寮國北部的「人民」與「國家」〉，本文記錄了1980年代中期寮國北部兩個官方博物館的族群展示，而呈現了族群自然分佈狀況與國家博物館話語脫鉤的例子，剛好提供了本期論文所探討的國家治理問題的另類視野。

劉紀蕙

2014冬於山湖村